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九辑

• 古诗卷 •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九辑·古诗卷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9辑, 古诗卷 / 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77-3909-1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334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8.75

字 数: 46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0.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张桃洲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目录

[中国诗歌研究史研究综述]

- 20 世纪初的先秦诗歌研究 李炳海 \1
清初诗歌研究综述 王小舒 \41
清代前期词研究综述 王小舒 贺 琴 \49

[吟诵专题]

- 论吟诵的基本方法 徐健顺 \57
吟边絮语 张本义 \85
吟诵相关文献索引（初编） 王霄蛟 整理编辑 \103

[论文索引与摘要]

- 2008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 …… 整理者：陈 曼 赵 熙 \135
2008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硕士论文索引 …… 整理者：成福君 \232
2008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
论文索引及摘要 整理者：宋鑫鑫 \272

[研究综述]

- 汉乐府诗叙事艺术研究综述 李晓玲 \326
陶渊明思想研究述评 刘 浩 \337
近十年来庾信诗歌研究综述 胡 政 \346
世纪之交前后十年间古代诗论史研究论著综述 吴建民 \366

[书评]

艺术生产理论下乐府学研究的开拓与深化之作

——读赵敏俐教授《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文晓华 \373

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的一部新作

——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石飞飞 \380

诗歌盛世背后的音乐制度和歌诗生产体系

——读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张文武 \383

《郊庙燕射歌辞研究》评介……张建华 \389

乐府学研究的复归

——读《鼓吹横吹曲辞研究》……王娜 \395

歌者的现场与诗意的呈现

——评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卫亚浩 \398

一部南朝乐府与歌诗研究的新作

——评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何江波 \403

从深度解读到体系建构

——评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王媛 \406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评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敬晓庆 \409

[学人志]

姚小鸥教授……424

李昌集教授……430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动态]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2010 年度工作总结……赵敏俐 \435

20 世纪初的先秦诗歌研究

◇ 李炳海

20 世纪最初 20 年，是该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具体时段是 1900—1919 年。这个阶段先秦诗歌研究的几位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他们严格意义的治诗活动都是始于世纪之交或世纪之初，正是 20 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第一阶段的起步时期。

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 20 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第一阶段的结束。章太炎、王国维作为先秦诗歌研究代表人物，他们对先秦诗歌研究的主要成果，均已在五四运动之前问世，到了 1919 年，他们作为学术领军人物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至于另一位先秦诗歌研究的代表人物刘师培，则于 1919 年故去。清末民初的这 20 年，作为历史阶段有其特殊性，在此期间所开展的先秦诗歌研究，同样有它的特征，那就是旧学与新知的交织。

第一节 世纪初 20 年治诗的格局及走势

20 世纪初的 20 年，正值清末民初（前 11 年是清末，后 9 年是民初，基本是各占一半），虽然在此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有些治诗学者在政治理念乃至社会实践上有维护帝制还是主张共和、改良还是革命的不同取向，但是，清末民初的先秦诗歌研究，并没有因时局的变化而前后迥异。20 世纪肇始阶段所呈现的治诗格局、走势，一直保持到这个世纪的 20 年代到来之前。就整个先秦诗歌研究领域而言，这 20 年无法作出明确的阶段划分，治诗的基本格局、走势，在此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一、经学治诗的夕阳晚霞

20 世纪前 20 年，是经学治诗的最后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以经学为本位研究先秦诗歌，出现的是夕阳晚霞般的学术景观，可以说是经学

治诗的回光返照。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治诗的两个阵营并存，齐诗派和毛诗派双峰对峙。

清代经学研治《诗经》者，明显分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两派，“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①。清代研究《诗经》的古文经和今文经两派，分别治毛诗和齐诗。清末民初对先秦诗歌的研究，沿袭清代经学治诗的余绪，也明显分为毛诗派和齐诗派两个阵营。

这个阶段毛诗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在1910年初刊行的《国故论衡》中写道：

汉世古文家，惟《周礼》杜、郑，《诗》毛公，契合法制，又无神怪之说。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②

章太炎研治《诗经》，确实专宗毛《传》，选择的是清人陈奂的《毛诗传疏》的路数，不但排斥今文经诗说，就连郑玄的《笺》也不时地被修正或舍弃。章太炎身体力行，专宗毛诗，这无异于树立起一面旗帜，对于当时的先秦诗歌研究具有引领作用。从1900年到1919年，毛诗学派的论文撰写者除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黄侃、邓实、江慎中、陈潮、陈庆麟等。^③除此之外，马其昶的《诗毛氏学》^④也在此期间问世。20世纪初期以古文经毛诗为本位的《诗经》研究，在规模上颇为可观。

清代今文经学研究《诗经》的代表人物是迮鹤龄，他所研治的是齐诗。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在研治《诗经》时，重点关注的也是齐诗，代表人物是廖平。他于1904年完成《诗经新解》^⑤，即题为《齐诗学》。1906年之后，他认为齐诗多纬候，转而研治诗纬，是对齐诗的进一步扩充，相继推出《诗学质疑》、《诗纬搜遗》、《诗纬新解》三书^⑥，他的齐诗研究已经自成系列。廖平曾与刘师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

①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

②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③ 参见寇淑慧编：《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第97、242—243页。

④ 京氏第一监狱铅印本，1916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本，1918年。

⑤ 收录于《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刊印。

⑥ 三书均为四川存古书局1918年刊本。

会，刘师培在此期间也有一系列关于齐诗的论文问世^①，虽然和廖平的取向不同，但亦构成呼应。

清末民初的先秦诗歌研究，毛诗齐诗均成为显学。而与齐诗同为今文经的鲁诗和韩诗，却很少有人专门探索。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是直接继承清代经学传统的结果，是清代今古文经学治诗的延续。

二、经学治诗内部的整合会通及偏执虚妄

清末民初的经学治诗有今古文之分，同时，经学治诗又出现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经学内部各派在治诗过程中进行整合、兼收并蓄，而不再专主一家之说。二是片面发展的倾向，把经学治诗的流弊推向极端。前一种趋向的代表人物是王先谦和马其昶，后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廖平。

王先谦是清代今文经学大家，他的许多著述都带有集大成的性质。他的《诗三家义集疏》初刊于1915年，以虚受堂家刻本行世。该书点校者写道：

王氏虽宗今文经学，以整理三家《诗》为己任，但对专治《毛诗》或今古文兼通的学者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等作，亦折衷异同，多所称述，使内容更为充实。^②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像他另外许多著作一样，体现的是经学内部不同流派的整合，具有兼容性。

马其昶是桐城派学者，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③。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属于宋学派，马其昶作为桐城派的后期成员撰写《诗毛氏学》，明显是以毛诗为宗，不再排斥古文经学。他的《屈赋微》^④对于相传出自屈原之手的25篇作品加以解题、注释、韵脚注音，引用诸家之说颇多，每篇的按语多是阐发作品的内容及章次结构，具有桐城派学者的特点。马其昶著作所体现的是汉学与宋学、古文

① 参见本章第三节“出入于今古文经纬的治诗实践”有关刘师培的论述。

② 吴格：《诗三家义集疏·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③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6页。

④ 《集虚草堂丛书》合肥李国松1906年刊本。

经与今文经的整合会通。其后人马茂元研治楚辞，与《屈赋微》一书密切相关，继承的是家学。

清末民初经学治诗的另一个趋向是片面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今文经治诗的廖平身上。今文经说本多牵强附会之说，到廖平那里又急剧膨胀，把它推向极端。廖氏沉迷于他所说的天学，多用纬候解诗。他的《诗学质疑》^①按照阴阳八卦之说，以天星有十二诸侯，纬以律吕配十二风，以此来解释《邶风》的编排结构，以首五篇为五帝，末三篇为三皇，中十二篇为四风十二诸侯。《邶风》本是19篇，廖氏为构造体系而强行凑足20篇之数。他还将这种解说方式推广到整部《诗经》，牵强附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廖氏解楚辞，同样采用牵强附会的解说方式，把楚辞纳入他所谓的天学之内。他的《经学四变记》写道：

《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于天学，详于六合之天。^②

说楚辞是《诗经》的支流，这是经学家的老生常谈，也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说楚辞的思想本于《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在时间上就无法落到实处。二者孰先孰后，至今尚无定论。《经学五变记》又写道：

《上古天真论》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读《内经》而后《楚辞》之本旨明。^③

把楚辞说成是脱胎于医书《上古天真论》，并且把它归入道家与神仙家著述的系列，楚辞被纳入了所谓的天学。

在此基础上，廖平又进一步断定楚辞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他的《楚辞讲义序》中写道：

① 四川存古书局1918年刊本，此前刊于《国学荟编》1915年第1期。

② 《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版。

③ 《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版。

《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楚辞》即《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诸篇。著录多人，故词意重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当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有呈撰，年湮岁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脱，多不可通。又仅掇拾《渔父》、《怀沙》二篇，而《远游》、《卜居》、《大招》悉未登述。可知《远游》、《卜居》、《大招》诸什非屈子一人撰。……《橘颂》章云：“受命诏以昭诗”，即序始皇为《仙真人诗》之意。^①

关于楚辞作品的归属，历来存有争论。尤其是《远游》、《大招》、《卜居》、《渔父》诸篇是否出自屈原之手，至今没有定论。廖氏对此表示怀疑亦属正常。至于把相当数量的楚辞作品说成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则实属臆想和猜测。文中所引“受命诏以昭诗”之语，出自《九章·惜往日》，把它说成是秦博士受诏而作《仙真人诗》，显得更加离谱。

对于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廖氏也否定是屈原所作。《楚辞讲义》第十课写道：

《离骚》解者无虑数十百家，无一人能通全篇之义者。……今据《秦本纪》以为始皇博士作，皆言求仙游魂事。又博士七十人各有撰述，题目则同，所以如此重犯。汇集诸博士之作成此一书，如学堂课卷，则不厌雷同。^②

廖氏不但断定《离骚》是秦博士所作，而且设想出当时写作的具体场景。文中还断定《离骚》“为九人作，合为一大篇”。这种想象确实很大胆，也很丰富，却无法得到实证。

廖氏用所谓的天学解读《诗经》、《楚辞》，不但把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受清代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出虚妄的态度。由牵强附会而走向虚妄，是今文经学的通病。龚自珍治《公羊》，师法今文经学派的庄存与、魏源，对毛诗大加非议。其子龚橙则重订《诗经》，百般排黜。廖氏解诗的牵强和虚妄，有其历史渊源，他

①《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版。

②《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版。

的导师王闿运就是用今文经学的《公羊》义解说《诗经》的。与廖氏处于同一时代的章太炎写道：“今文经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①以今文经学为本位治诗的历史阶段到廖平那里是其终结。廖氏解诗留给后代的主要遗产是牵强附会的做法和大胆而虚幻的想象，后来许多学者像廖氏一样陷入这两个怪圈而无法自拔，成为 20 世纪诗歌研究的误区和迷障。

三、旧知与新学错杂的诸种形态

清末民初的 20 年，犹如一年之中的晚冬早春交替的季节，反映在先秦诗歌研究领域，呈现的是旧知与新学多种形态的错杂。

第一，诗歌研究人员本身旧知与新学的错杂。

清末民初 20 年间，研治先秦诗歌的学者均以经学为本位，绝大多数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被打破，西学东渐、国际间的文化交往，使得许多人的知识结构、治诗理念都程度不同地渗入域外文化的因素。作为这个阶段研究先秦诗歌的三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和王国维，都有东渡日本的经历。章太炎、刘师培对诗歌研究方面的著述，对西方理论时有援引和参照。至于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已有精深的造诣，并且运用自如。即以本土文化而言，也出现旧学与新知相错杂的情况。孙诒让，字仲容，是清末的著名学者，在此期间曾刊过论文《诗不殄不瑕义》^②和《毛诗鲁颂駉传诸侯马种物义》^③，两篇论文是他去世第二年刊发。他的《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则是研究金文的著作。他的知识结构已与传统的经学家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增加了甲骨文方面的内容，已经具备运用甲骨文治诗的潜能。这是旧学，也是新知，是二者的交织。王国维正是以兼有旧学新知属性的金甲文治诗，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著述形态的旧学与新知的错杂。

这个时期推出的先秦诗歌论著，以札记、考据居多，传统的章句之学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的论著形态也开始出现。钱荣国《诗经

① 章太炎著、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9 页。

② 初刊于《国粹学报》总第 57 期，1909 年 7 月。

③ 初刊于《国粹学报》总第 57 期，1909 年 7 月。

白话注》^①是最早出现的《诗经》白话注本。陈直的《楚辞拾遗》^②则融汇古文字学、器物学、考古学和文献学为一炉，采取的是综合研究的方法。章太炎的《诂书》^③重订本《订文》、《检论·诗说》^④，以及刘师培《宗骚》^⑤都已经自成体系。至于王国维的《文学小言》^⑥，则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而章、刘的多数论著，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治诗著作的属性和特征。

第三，学术成果载体的新旧错杂。

这个时期登载先秦诗歌研究论文的刊物，主要是《国粹学报》、《国故月刊》，以及《四川国学杂志》、《国学丛选》、《中国学报》等。这些刊物多冠以国学、国故，带有明显的旧学印记。较为例外的是王国维的《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刊发于《教育世界》，这两篇论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为论文载体的刊物《教育世界》，从名称上就显示出新知的属性。尽管这类刊物在当时还为数不多，但已经预示未来的发展前景。

第二节 章太炎：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

章太炎是20世纪初期引领学界风气的一代宗师，在他构建的国学体系中，先秦诗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同时又融会旧学新知，标志着近代学术转型即将开始。章太炎学问淹博，对经史子集皆有涉猎。他全史在胸，又精通文字声韵，从而形成以缜密精深为特征的博雅型治诗体系。他对先秦诗歌所作的研究，散见于几部主要著作中。这些著作成为划分研究先秦诗歌的几座界碑，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这位古文经学大师治诗的历程。同时，章太炎研治先秦诗歌的论著，又是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尽管在他之后仍然有人以古文经学为本位研究先秦诗歌，但作为历史阶段，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不再是学术的主潮，不属于现代社会。

① 初刊于江阴礼延高等小学堂，1908年。

② 初刊于《摩庐丛著·三种》第2册，1912年石印本。

③ 初刊于日本东京翔蚕社，1904年铅印本。

④ 浙江图书馆木刻大字本《章氏丛书》，1919年刊行。

⑤ 初刊于《国粹学报》第2卷第3期，1906年。

⑥ 初刊于《教育世界》1906年第23期，总第139号。

一、《膏兰室札记》：古文经学治诗的早年尝试

1891年至1893年，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所师从经学家俞樾，《膏兰室札记》就是在此期间所作的笔记。膏，照明用的灯油，古时学校、书院发给学生的津贴费用亦称膏火。兰，谓兰膏，亦为点灯用的燃料。顾名思义，《膏兰室札记》是焚膏继晷、刻苦攻读期间的心得笔记。这部札记有些条目涉及到《诗经》，反映出章氏在治学初期诗歌研究的基本取向，为后来的诗歌研究奠定了基础。

俞樾是清朝末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章氏师从俞樾，研治《诗经》亦以古文经为主臬，力挺毛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认孔子删诗之说的可信。

有清一代，否认孔子删诗的说法颇为盛行，从朱彝尊到魏源都是如此。章太炎根据《华阳国志》所载周诗提供的线索判断，该诗作于周武王初封巴子之时。他在《删诗申义》中写道：

若夫不删诗，则平王以后之诗，尚附录《召南》（三家说《何彼襁矣》诗如此），岂武王时巴国之诗，不可附录也？若云毛《诗》遗说，可云祭祀之诗，好古乐道之诗，数篇皆脱耶？不删诗之说，本不足据。因读《华阳国志》而有感，为推论如此。^①

《华阳国志》所载的巴地诗歌，如果按地域划分，应该收入《召南》，可是《召南》并未收录。这几首诗或是与祭祀有关，或是好古乐道，属于正风之列，如果原来已经编入《诗经》，不可能遗失脱落。章氏据此推断，《诗经》结集前曾经被删减。至于究竟是谁所删，他没有具体指明，所持的态度颇为谨慎。他所援引的《华阳国志》的材料，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断定《商颂》是商代作品。

《商颂》的创作时段，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大悬案。章氏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引《汉书·礼乐志》及《艺文志》的记载，指出班固作为齐诗学者也认为《商颂》作于商代。文中写道：

则知齐诗家之说《商颂》，亦谓商人所作，与毛《诗》同。非

^①《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如鲁、韩二家以《商颂》为美襄公，及《商颂》为正考父所作也。^①

章氏对于《商颂》创作年代的看法，赞同毛诗和齐诗，而不同意鲁诗和韩诗的认定。他所援引的《汉书》的论述，是班固所持的观点。这两条材料比较重要，因为作为史学家的班固向来以行文严谨著称。

第三，维护毛《传》注释的权威性。

《膏兰室札记》涉及《诗经》的条目共九则，其中只要涉及到毛《传》，章氏都持赞同的态度，极力维护它的权威性，而对郑玄的《笺》、孔颖达的《正义》，以及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却是时有批评之语。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以毛《传》为宗，而对郑《笺》则斟酌取舍，就此而论，章太炎继承的是陈奂的观点。

章氏秉持古文经学的理念、方法研治《诗经》，以毛诗为宗。同时，由于他所师从的俞樾长于词义辨析，章氏在维护毛《传》权威性的同时，又能有所发明，对有些字句的解释更加具体、确切，《札记》中有如下一则：

《小雅·黍苗》：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案哉当借为载。下章云：盖云归处，则此章不宜虚用语词。《晋语》云：子馀使公子赋《黍苗》。下云：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此即本诗词为言，集德即我行即集之集，归载即归哉也。载亦训处，《老子》载营魄抱一。王弼《注》：载犹处也。是也。……至载哉之通，则犹陈锡哉周作陈锡载周也。^②

这段论述集中考辨“盖云归哉”应为“盖云归载”，“哉”与“载”通用。其中列举的既有作品本身的内证，又有春秋早期赋诗的旁证，立论极其坚牢。末尾所引“陈锡哉周”之语出自《大雅·文王》，鲁诗、韩诗皆作“陈锡载周”，有力地支撑了章氏的说法。再如对《商颂·长发》中“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所作的辨析，释“骏庞”为共玉^③，较

①《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②《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③《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

之毛《传》更加深入具体，可与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所作的辨析相互印证^①，皆为不可移易的精当之论。

章氏解《诗经》宗毛《传》，但是，《毛传》也难免有讹误之处。由此而来，章氏对《诗经》某些词语的解释也就失之于牵强。“周行”一词在《诗经》中出现三次，分别见于《召南·卷耳》、《小雅·鹿鸣》和《大东》。《卷耳》毛《传》释“置于周行”为“置周之列位”。《小雅·鹿鸣》毛《传》释“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按照这种解释，“周”不是指周王朝，而是指普遍，鲁诗、韩诗亦持此说。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稿一步伸张这种说法^②，章氏表示赞同，并且做了发挥^③。仅从上述三首诗来看，毛《传》对“周行”所作的解释虽然勉强可通，但已颇为不畅。如果从整部《诗经》来考察，毛《传》显然无法成立。《诗经》中与“周行”属于同类的词有“周京”，见于《曹风·下泉》；有“周道”，见于《小雅·四牡》及《何草不黄》；有“周宗”，见于《小雅·雨无正》。在这些诗句中，“周”字无一例外指周王朝、周地。既然如此，“周行”理应指通往周王朝国都的道路，即所谓的“周道”，就是当今所说的“国道”。

综上所述，《膏兰室札记》作为章氏的学习笔记，是他研治先秦诗歌的初试锋芒之作，显示出鲜明的古文经学治诗风格。其中有功底扎实的考据，也有度越古注的新见，在治学的专精方面已经奠定基础。不过，章氏真正成为博雅的国学大师，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

二、《馥书》：诗歌研究由专精到系统的桥梁

章太炎的《馥书》初刻本行于1900年，是作者第一部自选集。其中涉及先秦诗歌的内容很少，只有《独圣》篇提到《大雅·生民》、《订文》篇提到楚辞《天问》，后者尤其值得重视。文中写道：

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言语，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营造之始，则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后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禹之铸鼎

①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1—1112页。

②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98年《清人注疏十三经》（一），第15页。

③ 《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而为螭魅，屈原之观楚庙而作《天问》，古之中国尝有是矣。^①

章氏上述文字把文学与绘画相沟通。禹铸九鼎的传说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和《墨子·耕柱》篇，他把这个传说与楚国宗庙的壁画相联系，用以解说《天问》的创作缘起，是以史证骚。他还把《天问》是屈原呵壁而作这个案例放到古代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并援引斯宾塞的说法作为理论依据。这种解骚方式已经冲破传统的国学樊篱，开启了后来兴起的比较文学的先河。

《虬书》重订本初版于1904年，由日本翔湾社铅印刊行。章氏在进行重订过程中，在《订文》部分增添了许多初刻本所没有的内容，其中有如下一段：

若《诗》“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受言藏之”之辈，以今观之，皆可训“间”，而传皆训我，笺则言“训”“我”者，凡十七见。近人率以诂训不通病之。……夫绝代方言，或在异域。日本与我隔海而近，周秦之际，往者云属，故其言有可以证古语者。彼凡涉人事之辞，语末率加“事”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辈，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异东方，而“言告”、“言藏”之训“我”，则正与东方一致。以今观古，觉其诂训，犹以汉观和尔，在彼则调达如簧矣。^②

章氏还是秉承古文经学的传统，对于诗歌的解读重视词语的考释。这里讨论的是间语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发语词。其中涉及的语料均取自《诗经》，包括《卷耳》的“采采”，《载驰》的“载驰载驱”，以及与“言”字相关的诗句。章氏曾东渡日本，并在那里驻留较长时间。他把日语相关表述方式与《诗经》中的间语相对照，指出二者的相通之处。只是《诗经》把发语词置于前面，日语则置于语末。这是以宏阔开放的视野观照《诗经》的间语，把先秦诗歌的发语词与日语相沟通，解决了《诗经》词语训诂的一个难题。

章氏在做了上述对比之后，又有如下论述：

①《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②《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